

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賈承詒同志在山东省农业
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根据录音整理)

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翻印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

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賈承让同志在山东省农业 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根据录音整理)

各位首长、各位领导、与会同志们：

。这一次我到山东，是受大寨党支部和大寨贫下中农委派到山东很好地学习。我这次主要是到山东当小学生，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在地学，把山东首长和与会同志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一定要真正学到手，要带回去，在我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开花结果。这是主要的任务。再一个任务，就是要向山东首长和领导、与会同志们，还有我们的老师，汇报一下我们大寨如何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过来的道路。但是，我今天光怕向首长和与会同志们汇报不好，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从我本人来说是在旧社会走过来的，在旧社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没文化。当然没有文化，学习主席著作差距就太大了。就是大寨贫下中农用主席的思想武装头脑做了一点成绩，成绩也是很小的，缺点和错误、差距是很多的，恐怕汇报不好。但是我尽力量来汇报好，下定了决心，尽量往好里汇报。还有一个，我是从山西到了咱们山东，一个山西一个山东，口语上也怕有些不同，恐怕有些

话听不清，与会首长和同志们可能还有山西人，可以给我来当一当翻译。可是山西土话多，从昔阳县、从大寨大队来说，我们住在虎头山下，从山沟里头长大的人，说土话就更多了，请首长、领导和与会同志们原谅这一点。口语上有些不同，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讲稿，就是从我本人说，我就是生在大寨，长在大寨，就是从大寨开始变样，一直到现在。我想怎么做的就怎么说，这就是依实际来说，请首长、领导和与会同志们原谅这一点，听了以后，有错误的地方，请首长和同志们来给指正。我从开始还是说大寨，主要是说大寨吧。

大寨村过去是很小的一个村子，户数不多，人口也不多。大寨这个村子，在黑暗的旧社会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小山庄，过去旧的说法就是“三穷”：人穷、地穷、村子穷。在当时村里有六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人，从成份来说，村子小、户数不多，还有地主，还有富农，还有富裕中农，一户地主，三户富农，十二户富裕中农，其余六十多户人家都是贫下中农。人口是二百多口人，百分之七八十是贫下中农，一年四季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大寨在黑暗的旧社会那时候造成“五多”。哪五多？就是赶牛放马的多；再一个就是扛长工打短工，在外流浪的多；再一个就是讨吃要饭的多；再一个是卖儿卖女的多；再一个就是扛长工打短工（扛长工就是给地主、富农做活的），这些人年老了，不能给地主和富农干活了，没有办法，只有寻死上吊，就是自杀的多。这是大寨过去的“五多”。大寨的面貌、自然条件，也不算很好，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这么一个穷困地方，全村有七百多亩耕地面积。这些地都分布在

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寨过去没有平地，现在有了平地。过去就是七条大沟，十七条小沟，合起来二十四条沟，现在都变成了水平梯田。过去都在山坡上种田，现在沟地变成良田。那时候土地也不算肥沃，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三天没雨苗发黄，下场急雨地冲光，就是这么一个条件。三天不下庄稼就发了黄了。但是想雨盼雨，下场急雨，连土带肥冲个光。地里上粪地边流，冲走肥土露石头。那时候通常年景、好年景，亩产就是一百多斤的产量。

一九四五年解放了，红太阳照亮了虎头山。从一九四六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这整整的二十年中，我们大寨贫下中农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也和大自然进行了斗争。二十年时间看起来不算长，但是也不算短。二十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通过同阶级敌人斗，同我们干部和贫下中农头脑中的“私”字斗，也就是同天斗、同地斗，大寨的党支部和贫下中农，越斗越硬了。大寨支部和贫下中农站得高了，看得远了，想得多了。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种田为革命。大寨的面貌由穷变新了。看村是一片新，看山是一片青，土地过去土层很薄，现在地平土层厚，也就是土层深。河沟变成地，产量步步升。在解放初期（一九四六年）亩产一百多斤，办社第一年（一九五三年，办起了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社）亩产就增加到二百五十斤。公社化第一年（一九五八年）上升到五百四十斤。一九六四年是我们受毁灭性灾害的一年，亩产仍达到八百零九斤。一九六六年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亩产八百二十斤。把老天斗得低头了。大寨从合作化以来，无灾大丰收，小灾保丰收。从办社到现在，已经十八年时间

了，遭灾没有减过产，十八年没有一年减产的，每年有灾，但是我们大寨不怕灾，我们深深体会到，遭灾是坏事，但是能变成好事。我们是大灾大变样，小灾小变样，越是灾害大，变样越大，对国家贡献也增加。我们办社是一九五三年，卖给国家是四万五千斤，这是办社第一年。一九五九年以来，每年我们大队交售给国家的余粮都在二十四万斤以上，每户平均三千斤。十八年的时间共卖给国家的商品粮三百二十多万斤，每户平均四万多斤。这是我们变化的基本情况。

再返回来给首长细致地讲一下大寨穷，“三穷”到什么地步。第一个是土地穷，就是产量低，没有平地，都在山坡上种田，好年景亩产一百斤。土地穷带来的人也就穷了。在过去大寨扛长工的多，他们的说法就是：“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这就是大寨永永世世不能变。到底能变不能变？从黑暗旧社会来说，大寨就是不能变了，穷就是穷，富就是富，富是天生的，穷是造就的。这是人穷。再是村子穷，大寨是一个穷山村，村子很小，六十多户人家，周围离大寨三十里路到四十里路，不知道有个大寨村。过去就是地主和富农，还有旧社会伪政府知道有个大寨，逼租呀逼债呀，要粮呀要款呀，要物资呀，知道有大寨，其余的人不知道有个大寨小山庄。这就是“三穷”。

从一九四五年解放了，我们大寨陈永贵同志，他确实是我们大寨贫下中农的领班人，带领大寨支部、贫下中农，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引的航向，要组织起来。四五年解放，四六年组织了互助组，互助组搞了七年。五三年和五二年冬季，搞了个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社，五四年全大队合作化。五三年搞了四十九户；五四年全大队就八十户人家

了，全大队合作化。从合作化以后就是怎么变大寨，大寨能不能变？怎么变？谁来变？合作化以后，我们陈永贵同志说，大寨力量大了，就可以改变大寨的穷面貌。大寨有七条大沟嘛，能够变成几百亩地，还有子母沟十七条，还有八道大梁（就是转圆边低，里边高）要变成平地，七条大沟变成良田，一面坡要变成梯田。如何变？这时，大寨支部和贫下中农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五三年到六三年完成。能不能完成？能不能变？订了十年造地规划以后，让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来讨论这个问题，先变哪？后变哪？能不能变？这时一讨论出了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了呢？第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组织起来力量大，天灾人祸都不怕”。这确实是对的。一讨论第二个问题怎么变？怎么走富裕道路？怎么改变大寨穷的面貌？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出现了，他说什么“要想发财快，就要做买卖”。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搞副业，搞什么副业？搞不正当的副业，搞不劳动就要多赚钱的副业，搞少劳动多得食的副业，搞一个钱买下卖十个钱的副业。也搞点农业，也搞些不正当的副业。这时候我们陈永贵同志不干，他想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阶级和阶级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盟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时，我们陈永贵同志教育支部、教育贫下中农，在做工作的时候，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人对事对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寨的穷面貌改变过来。也就是教育贫下中农懂得了打击谁，团结谁，依靠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教育贫下中农不让旧的剥削阶级在农村复辟，不让新的剥削阶级在农村藏身。

教育贫下中农不要变了质，不要迷失了路。教育贫下中农不要迷失了方向，如果集体力量大了，迷失了方向，就要走错了路，方向歪了，线就偏了。这就是我们永贵同志想到主席教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这时候就开始放弃了十年造地规划，抓住思想教育，用政治思想统帅一切。这样看，好象大寨不好变了。但是想到主席的教导，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变化法，学了就能进步，用了就能起变化，学得深用得好的，就进步快、变化大。从这开始就努力学习。这变化那变化，全靠斗争来变化。我们干革命就是进行斗争创造条件，做变化工作，使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使事物朝着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方向转化。因此，不断的揭露矛盾，坚持斗争，在“变化”二字上狠下功夫，做到“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和物的关系，决定的因素不是物，是人，主要通过人来起作用。这时候，地能变不能变？怎么变？学习了以后认识到，变地先变人、变人先变心。地倒好变，只要有了好思想，就有了好干劲，有了好干劲，就有了好产量。变地得从人起。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只要有了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人的头脑，变地就有了灵魂了，就有了力量了。改造自然有灵魂、有力量，就能改天换地。丢了变人这一条，变地就没有带头的东西，没有挂帅的东西，就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生产必然也上不去，自然也改变不过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自觉地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带动各项工作。

今天给首长、领导和与会同志们不讲我们大寨生产方面的东西。我们从生产来讲，产量是落后的。我知道山东有一千五百多斤的亩产，一千斤以上有的是。我主要汇报一下大寨如何做好思想工作。如何实现干部、党员、贫下中农思想革命化，来带动其他工作。在这时候就抓住学习，做好变思想的工作，思想变了，土地也就变了。思想变了，一切工作在变。做政治思想工作靠谁来带头？我们永贵同志讲了：打铁先得本身硬；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支部；工作好不好，你在支部每一个同志身上找。这是我们深深体会到的一点。支部是教育人的，首先要受教育。教育人不如人，你就教育不好人。怎么受教育？我们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有两个要求：一个要求，支委成为党员、贫下中农的表率；第二个是全面发展，既能文，又能武，从学习到劳动，从营生质量上，从勤俭过日子上，从各个方面都成为表率。你是共产党员，人们都跟着你走，你必须起到表率作用。

第二个，是划清两个界限：第一个是划清敌我界限。你和谁是一家，谁是你的亲人，谁是你的敌人，这个界限必须划清。为什么我们大寨还这样注意呢？大寨是姓贾的多。从贾进才同志来说，他大叔是富农，他二叔是富农，他三叔是地主。贾进才弟兄三个，有两个党员，这还很亲。你这个界限怎么划？你和他是一家呀，还是分家。以“贾”字看来是一家，以阶级看来是敌人。所以这个界限你必须划清。但是紧教育慢教育，贾承福是一个党员，他儿子结婚的时候，我们山西要挂家谱，洋布划上死了的人名字，不知山东有没有，我们山西是有。续家谱，拿出来要挂着它。我们支部紧

教育慢教育，他给挂起来了。我们就不让他来挂，教育他，你是跟敌人分家呀，还是跟敌人一家？就是指这讲的，教育党员要划清界限，不是一家，不是你的亲人。过去给他扛长工，为什么他富，自己穷呢？再一个就是划清“公”和“私”的界限。教育党员是看着集体为重还是看着自己为重？还是身在集体、思想在单干？必须划清楚。是先公还是先私？党员必须先公，先公后私。

教育党员坚持两项制度：一个是党员包户制度，一个是饭场会的制度。大寨百十户人家，二十个党员，每个党员平均几户，以社员居住的条件，党员分别包下来。包什么呢？一切包下来，也跟交朋友一样，他有什么跟你讲，你有什么跟他谈，了解思想，都能得到真实的思想。再一个饭场会的制度。从互助组开始，从初级社到现在，时间很长了，我们这个饭场会很得力，既能安排农活，又能学习主席著作，又能表扬好人好事，又能批判坏人坏事。有不健康的思想，过去是面对面，现在是用主席的思想，用主席语录写个条子，放在他桌子上，针对他的思想教育他，还能节省开大会的时间，一般的问题，饭场会就解决了。我们这个饭场会现在不叫饭场会了，叫政治日清月结场所，当天发生的事情当天在饭场会解决，不能拖的时间长，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早晨起来到饭场上就解决了，不管干部也好、群众也好，解决了以后他就不背包袱了，他就心情舒畅了。人一心情舒畅，干活也就舒服了，也就把本人的潜力挖掘出来了。如果背着小包袱，思想不愉快，心情不舒畅，干活潜力挖不尽，本人潜力挖不尽，集体生产受损失。因此，要当天事当天解决，个人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集体不受损失，心情舒畅，这才能

够挖尽本人潜力。

再是采取两个方法：一个是抓住贫下中农的好人好事，拿到支部大会上教育党员，一个是对照社员的好思想、好典型，抓住小问题。什么叫小问题呢？你看抓不抓，支部是教育人的人，是带头的人，说了算数，一句话也能起作用，一句话也能起不了作用，还坏点事。举一件事情讲一讲。我们过去打粮食不多，也没有那么大场子，仓库也没有修起，打下的粮食全部给社员，打一场分一场，打一天粮食，到晚上全部给社员分下去，没有地方来保存。每天打一万多斤粮食。一天晚上，在场上分粮食了，全部社员都要到场，有地主富农、有富裕中农，什么人都有，什么事情也有，当时一个党员同志说，不要每天晚上分粮食，打的不多，不值得熬眼，攒一攒再分，也值当一些。这句话好不好？是对呀不对？对的地方呢，他心疼社员每天晚上到场熬眼，不值当的；不对的地方呢，场上什么人也有，有过去的地主，有富农，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很多，特别是富裕中农，他们过去打一场都是自己的，现在我们打一场，每户分的不多。那是地主富农想说的话，我们一个支部同志代替他们讲了，这是不好的地方。这个问题要抓住。这个话是给无产阶级长了志气，还是给无产阶级灭了威风？给谁长了志气，给谁灭了威风。我们分罢粮食，就是十二点钟以后，还要召开支部会，教育这个同志。这叫小问题，就看抓不抓。如果光抓技术，不去抓这样的事情，你不认识它，那就象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陈永贵同志对党员是很严格的。党员说了是算的，能协助贫下中农，也能伤害贫下中农。我们受教育里边，就是要注意这么几点。

通过受教育，我们认识到，大寨能不能变？能变。这时，我们又提出五变，五不变。五变就是：思想变，土地变，技术变，产量变，村庄变。细说起来就很多了。首先是思想变。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变化是很快的，一会儿是这样想，一会儿是那样的思想。这是五变。五不变：从党员，特别是干部，永贵同志讲了，干部干部，先走一步，就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变，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不变，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不变，勤俭节约、反修防修的思想不变，劳动人民的本色和本质永远不能变。这就是党员、干部受教育注意到的地方。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我们陈永贵同志先搞思想革命化，又注意到十个明确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方向要明确。这重要那重要，掌握方向盘最重要，就跟开车一样，没有明确的方向，不是开到沟里，就是开到岭上。方向明确了，线也就正了。方向不明确，线也就偏了。

第二个是，要有坚强的意志，也就是要站稳立场，天大的困难吓不倒，天大的困难难不倒。我们大寨支部和贫下中农有五不倒的精神：条件坏难不倒，灾害大吓不倒，成绩大喜不倒，荣誉高了夸不倒，继续革命，歪风邪风吹不倒。大寨不是一帆风顺走过来的，是从一直斗争斗过来的。灾害越大干劲越大，办法越多。不怕灾害，就怕党支部和贫下中农思想招了灾。天遭灾，小灾能够变大灾，大灾能够变成小灾，小灾能够变成没灾。思想如果遭了灾，那就没灾也成

灾。

再一个就是坚持斗争，就是党员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没有斗争就没有团结，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你不斗它，它斗你？你斗它，它认输，它失败。

再一个，就是领导班子的根子必须扎在贫下中农身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党员、干部要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广大群众，就要让贫下中农、广大群众监督自己，改造自己，教育自己。贫下中农讲过去，讲村史，讲家史，讲社史，他们有深刻的体会。一定要让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个干部，一个党员，如果不受贫下中农改造和监督，是一事无成的。再就是先公后私，真正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要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要抢“三活”：脏活、重活、关键活。共产党员要说真话，不说假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说实话，办实事，不能有虚假现象，这是我们注意的地方。

再就是路于要走正。走什么路，是走无产阶级路呀，还是走资产阶级路呀？讲一下大寨走过的路。我们大寨从五三年建社到现在，完全都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过来的。大寨从五三年到现在，没有卖过一粒（两）高价粮，没有卖过一分钱的高价物资。他们卖高价，我们大寨大队，永贵同志和党支部带领贫下中农卖低价。从五三年开始，有人一直不满意大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现在有没有呢？现在是少数了。大寨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都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因为大寨走的路和他们不同。

我们大寨在五九年六〇年那几年，思想工作是不好做的。每天晚上干部党员下去，到贫下中农社员家里，诚心地

做一晚上思想工作，当时做好了。我刚才说了，人的思想比电还快，睡了一晚上，明天到地里劳动。我们大寨周围大队相距二华里路，从吴家坪到我大寨村头二华里，井石坡也是这样，顶多的三华里路，但是他们和我们地连、山连，思想不连，一点也不满意大寨。他们打下的粮食要搞隐瞒，看着我们大寨不搞隐瞒，他们有意见。那时候，大寨和吴家坪，几个大队并一个乡，从开始搞乡到公社，没有大队和我们大寨满意搞一个公社的。文化大革命以来，认识提高了，才真正把这些思想打消了。他们为什么不满意和大寨搞一个公社呢？他们说，有大寨要跟着吃亏，要跟着陈永贵吃亏。吃什么亏呢？因为大寨向国家卖粮食多。我们永贵同志讲了，多卖些粮食不好？多卖粮食对国家建设国防建设有好处。他们反对我们多卖粮食，反对我们不隐瞒，反对我们不卖高价。但是，我们没有象他们那样搞私分。那几年，他们打上二十万斤粮食，只说十五万斤，悄悄地拿下五万斤。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合作化道路的威力没有了，走集体化的优越性也抹杀了。拿下五万斤怎么处理呢？给社员分上三万斤，实际口粮是二百八或三百斤，再分三万斤，口粮就加高了。我们大寨吃四百斤口粮还得瓜菜代，没有瓜菜代，光吃四百斤粮食，每天劳动是不够吃的。瓜菜代他们不满意。吴家坪和大寨的地头接地头，有的社员到那边和他们抽一袋烟，几分钟时间，思想就带来了。他们说什么，你们吃着四百斤，我吃着二百八，我们吃的玉米面窝窝头，你们四百斤吃糠面窝窝头。社员和社员这样一讲，有的社员就回来和干部闹矛盾。你说这问题好解决！？思想工作是不好做的。

他们还说什么，你们大寨每年卖二十四万斤以上的粮食，每户平均三千斤，我们集体就不卖储备粮，我们卖二万斤粮食（高价），比你们卖二十四万斤到三十万斤粮食的钱还多。那时确实是这样，当时卖高价粮，从昔阳县来说，一斤玉米块把钱，卖二万斤玉米就是三万块钱，我们卖三十万斤粮食吧，六分钱一斤，才卖几个钱，当然不如他们卖的钱多了。因此，社员也和干部闹矛盾，有的回去骂干部，骂陈永贵，骂什么？人家喂狗是往外咬的，大寨喂的狗是往内咬的。还有一种骂法：人家的胳膊是往里拐，陈永贵的胳膊是往外拐的。还有的说，为了陈永贵当模范，粮食都卖给国家，就是为了上太原多吃些白馍馍。那陈永贵家里没有白馍馍！当时我们陈永贵同志就教育社员，不要羡慕人家卖高价，并以身作则，说实话，办实事，不搞虚假现象。

但是，大寨逐年土地修好，产量增加，收入增多。县里召集周围大队到大寨看看整修土地，学学大寨。但是吴家坪不学还骂，说什么呢：不学大寨！那时候没有马路，我们有两辆胶皮车，出来要走吴家坪村边的河，早晨出去，中午回来，他们就把路垒了，不让车过来，严重到这种程度。还说，学大寨，有什么学头呀，学大寨肩上不离垫肩，学大寨晚上不离磨杆（那时妇女白天上地劳动，晚上要推磨磨面），学大寨吃饭里头还有个片片。就是不学大寨。一直反大寨。

那几年是他们反，我们干。他们越反的严重，我们越干的强，越反越干。特别是五九年六〇年那几年困难的时期，周围大队他们反大寨的，人没有粮，畜没草，但是大寨越反越硬，越反又有粮食又有草。我们永贵同志是共产党、毛主席从旧社会救出来的，他忘不了过去的苦，虽然人家反

大寨，他还是给他们解决困难。那几年，周围有的大队，已经下罢种了又向大寨借种子，一借就是几千斤。为什么下了种了还借种子呢？永贵同志发觉了这个问题，就问他们，最后说了实话：社员一点粮食也没有了。没有粮食吃妨碍生产呀！永贵说，大寨有粮食。那几年，大寨借出九万多斤粮食。他们说打下来就还，四五个年头也没还了，因为他们的产量一年比一年低，怎么还粮食？后来，他们说按议价给钱，我们永贵同志说不要议价，给不了我们粮食就以国家牌价六分钱一斤，九万斤粮食都给了钱。这是粮食。

从谷草来说，牲畜没草，这不是一个大队，全昔阳县都是这样。但是大寨存有五万斤谷草，当时价格很高，三毛钱一斤，有的社员就说，这回可等着了！永贵同志听说这情况后，就开支部会，问大家怎么办？同志都说，不要叫周围大队为难，咱把存的谷草售出去，卖多少钱一斤哩？陈永贵同志说：咱要想想过去，为什么大寨存下了草？为什么过去没存下草？这存草是谁给的？谁让存下这谷草的？讲了旧社会以后，又讲了九大灾，最后，支部统一了思想，决定按国家牌价卖出去。开贫下中农会讨论，大家都说可以卖出去。永贵说讨论以下，谷草卖多少钱一斤呀？有的说，其他地方三毛钱一斤，咱们卖二毛五，少五分钱。这时永贵同志讲了：那还不错，大寨贫下中农这几年用主席思想武装头脑，提高了五分钱的思想。接着，他就开始讲了过去，讲过去咱贫下中农怎么没存下一根草呢？是谁给存下的草呀！最后贫下中农认识了，是共产党、毛主席给存下的，统一了思想，用国家牌价三分钱一斤卖了出去。

卖草还不能卖给一个地方，还要分配好，有一个买草

的，赶着车子，一进村（他不认得陈永贵同志），碰着陈永贵劈脸就说，一斤草给二毛半钱，我们买几千斤草。永贵同志很生气：我们没有二毛半钱的草！没有草了，卖完了。这个同志说，没有了就是给的价钱低了，三毛咱给二毛半钱人家就不卖，说没有二毛半的草。他不买了，赶出车在村外碰上一个买草的，那人和他认识，就问：你到大寨怎么没有买下谷草？他说：三毛钱的价格我给二毛半，人家很生气，说没有二毛半的谷草！没有了！没买来。那人说不要这么说，大寨不是卖这样的价钱，你回去吧！你不要讲价钱，你把草装上，会计算下多少钱你就掏多少钱就行了。这个人还不相信，他当时的思想是：价格是三毛钱，如果不讲价钱，把草过了去上了车，如果他再要三毛多了，我可咋办哩！他又怕吃了亏，等回大寨装上草，一算是三分钱一斤，这个人很感动。他说：哎呀！我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大队。这样，三分钱一斤，把五万斤谷草全卖出去了。这就是大寨走的路。不卖高价，大寨也没有穷下来，而是越过越富。我们不搞投机倒把，不搞卖高价，我们还要反对卖高价。在五九、六〇年时赶庙会（农活闲时），那时正是困难时期。那天我们大寨社员、干部都上城里赶庙会，一进城，看到有个卖粥的，想种地发财，二毛五分钱一碗，吃的人很多。买一个花卷是一毛五分钱我们永贵同志马上集合支委在城里开了个临时会，说咱们要抵制，要跟他们作斗争，咱们马上回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发动贫中下农，咱们有面，拿出来，每家贫中下农都蒸花卷，和他们卖一毛五分钱的一般大，卖五分钱一个，压倒他的一毛五。大寨用大车拉二车粉条，也是和他们作斗争，他们二毛钱一碗汤，我们是一毛钱一碗粉条汤，全是粉

条，和卖高价的作斗争。

再一个，大寨干部，我们陈永贵同志自五三年建社到现在，在大寨大队没有吃过集体的东西。从出去开会，车费、一切盘费没有在集体开过一次。我们都是这样，大寨没有干部的开支问题，从住房呀！路费呀！没有开过，都完全是自己的。特别是近几年，到大寨来帮助工作的首长呀，记者呀，很多！过去我们大寨没有食堂，去了就是派饭。派饭怎么搞的呢？根据劳力，我们大寨妇女半边天也是起好大作用的，七沟八梁一片坡块块哩！过去大寨四千七百多块土地，现在变成一千八百块，这些土地上都有妇女的汗水，离了妇女，劳力也是受损失的。留一个妇女做饭也是可惜的。怎么办呢？寻了一个老太太，专门给首长或记者、或帮助大队工作的人做饭。做饭总要做点好饭吃，好饭不能只吃一斤面，谁吃饭也不能吃光，吃光就不好看了。永贵同志说：从实际出发，合上一斤二两，一斤三两，剩一点可以，不要不够吃，吃饭吃好嘛！按理说永贵同志陪陪首长、客人吃饭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永贵同志总是不肯，不陪客，看起来不礼貌，可是有好处。吃剩下的怎么办？就卖给贫下中农，什么都有，饺子、面条，卖了都要上账。一上账，上出麻烦来了，县里搞农业税的到大寨查农业账了，打开账一看，说大寨队是先进队，你们还卖饭哩！卖饭你们怎么不上税？会计说：这是待客人剩下的饭，卖了钱还上什么税呢？他说：不管怎么，账上有的东西就要上税。会计说，如果叫队干部吃了，账上没有你还上什么税？你这是帮助我们干部多吃多占。最后没有办法，给县里的领导挂了个电话讲一讲为什么账上有饺子、花卷，领导上说还是大寨做的对，不应该上税，要都成